

从“马来化”“英化”到“再华化”

——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新加坡土生华人为中心的考察*

张 晨 怡

内容提要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社会经历了一个从“马来化”“英化”到“再华化”的过程。新加坡华人的“再华化”不仅是关乎文化的,也是关乎政治的。在文化方面,主要表现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追寻,具体包括华语运动的滥觞和儒教复兴运动的兴起。在政治方面,主要表现在对中国政治的强烈关注与积极参与,并在对中国改革与革命运动的回应中形塑了新加坡华人的民族主义情感。

关键词 新加坡华人 马来化 英化 再华化

新加坡毗邻马六甲海峡南口,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据福康宁山(Fort Canning)等处考古发掘以及《岛夷志略》等古籍记载,在 14 世纪,新加坡岛上已有华人聚居。1819 年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宣布新加坡开埠后,更吸引了大批华人纷纷涌入。华人离开中国本土,迁徙到东南亚,难免受到当地马来人的影响,峇峇文化即是在融合中华文化与马来文化的基础上形成。此外,由于英殖民政府文化殖民主义政策的影响,在峇峇社会中,除了早已有之的“马来化”(Malayanization),还出现了明显的“英化”(Anglicization)倾向。19 世纪中叶以后,移民到新加坡的华人越来越多,新客华人(China-born Chinese)显著增加,促使清政府逐渐关注到新华社会。清驻新加坡领事馆的设立与历任领事官在文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新华社会的“再华化”(Resinicization)打下重要基础。随着新加坡华人“寻根”意识的增强,新华社会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再华化”过程,不仅深刻影响到新华社会的文化形态,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变革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新加坡华人“再华化”的问题,目前学界研究还不够深入,虽然已有部分学者在相关研究中有所提及,^①但尚缺乏专门的论述,这与学者对 20 世纪末期以来东南亚华人“再华化”研究的热度完全不能相比。基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新加坡华人“再华化”的文化表现与政治影响等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一、新加坡华人的“马来化”与“英化”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的“再华化”,是继新华社会特别是土生华人出现“马来化”和“英化”现象之后发生的,是海外华人文化再造的重要体现。“马来化”和“英化”,是新加坡华人在

* 本文系国家民委委托课题“新时代中国边疆民族治理理论研究”(2019-GME-064)阶段性成果,亦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路径与模式研究”(15ZDB028)资助。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详见李元瑾《从文化殖民的视角重读新加坡海峡华人的失根与寻根》,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4 年第 2 期;严春宝:《林文庆儒学思想研究》,载《哲学动态》2012 年第 11 期〔美〕孔飞力著,李明欢译《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年。

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和对当地社会的参与中结合了新的文化要素所产生的本土化。要探讨“再华化”问题,首先要厘清新加坡华人文化形态由“马来化”“英化”向“再华化”转变的演进过程,以便理解其不断变化的文化形态。

(一) 语言、精神信仰及生活习俗的“马来化”

明清时期中国政府虽然长期实行“海禁”,但是仍有大量华人移居海外。东南亚由于距离中国较近,成为大部分华人移民出国的首选之地,并逐渐汇聚成了“下南洋”^①的洪流。在莱佛士宣布新加坡开埠之前,华人已经得到柔佛苏丹派驻新加坡大臣天猛公的同意在实利基山、福康宁山和珍珠山一带种植甘蜜。1819年之后,在自由贸易政策的吸引下,更有大批华人从马六甲、檳城、廖内群岛以及中国福建、广东等地移民过来,聚居于尼路(Neil Road)、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等地。新加坡开埠之初,第一大族群为马来人。据统计,1824年,新加坡人口总数为10683人,其中马来人人数为6431人,华人数为3317人。^②由于长期生活在马来人群中,在与马来人持续深入的接触过程中,华人群体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马来化”倾向,其中土生华人(Peranakan Chinese)“马来化”的程度尤为严重,“包括应用马来语,穿马来服装以及吃马来食品”^③等。

华人移民东南亚,与当地通婚融合由来已久,明代典籍《星槎胜览》《东西洋考》等均有相关记载。晚清以前,华人移民中绝大部分为男子,女子数量极少,华人男子往往选择当地女子婚配,“峇峇”(Baba)^④即是华人移民与马来妇女通婚后繁衍的后代。“峇峇”虽然注意“维持、保护、保卫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⑤但是在涵化的过程中难免入乡随俗,兼容马来文化特征,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峇峇文化。

峇峇语(Baba Malay)是峇峇文化最突出的表现。“峇峇”多不谙汉语(方言),而以峇峇语为母语。峇峇语混杂了闽南方言与马来语,其特点是“语音采用马来语、词汇存在着大量的汉语闽语借词,语法结构受闽南语语法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闽语借词进入马来语后失去原有的声调特征,并且不易找回其来源”,^⑥可见“峇峇”在语言上“马来化”的程度之深。

在精神信仰层面,“峇峇”保留了华人多元的传统信仰,家家都有神主牌,既重视祖先崇拜,也祭祀观音、妈祖、关公、大圣爷(孙悟空)、大伯公(土地神)等神祇,同时还吸纳了马来民间信仰祭祀拿督公(Na Tok Kong),并“掺杂了马来人巫术的成分”。^⑦华人认为拿督公和大伯公是职能相似的神祇,设有“唐番拿督神位”牌,牌的两旁一般有“拿扶家家好,督庇户户安”^⑧之类的联语,还因地制宜,用酸柑、沙爹等物供奉,来祈求拿督公的庇佑。

在节庆礼俗方面,“峇峇”传承和沿袭了华人的传统节日习俗和婚丧嫁娶仪式。据英殖民地官员沃恩(J. D. Vaughan)的观察,“华人是如此执着于保持他们祖先的习俗,尽管他们在海峡殖民地

① 南洋是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人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据李长傅的研究,明代时“无南洋之名,而只有东洋、西洋”,“故郑和之航行海外,只有下西洋之说也”,“清人记载始有南洋之名”,“但当时国内另有南北洋之名称”,“而此海外之南洋则通称为南洋群岛”。详见李长傅《地理学上所见之南洋》,载《南洋研究》,1931年第6期,收入《南洋史地与华侨华人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07页。

② 详见苏瑞福《新加坡人口结构的变化》,载《南洋资料译丛》2008年第4期。

③ 廖建裕《马来西亚的土生华人:回顾与前瞻》,何国忠主编《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5年,第26页。

④ 广义的“峇峇”,包括男性和女性,而狭义的“峇峇”专指男性,女性一般被称为“娘惹”(Nyonya)。

⑤ 王赓武《中国情结:华化、同化与异化》,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⑥ 崔彦《峇峇马来语研究综述》,载《汉学研究学刊》第六卷,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15年,第111页。

⑦ 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4年,第99页。

⑧ 陈志明《东南亚华人的土地神与圣迹崇拜》,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已与所有国家的原住民相处了好几代,但仍小心翼翼地保留着他们古老的风俗习惯。”^①虽然如此,华人的节庆礼俗还是处处可见马来元素。例如“峇峇”“娘惹”婚嫁时遵行明清以来的华南古礼,但是在婚庆中却由马来男子或身穿马来服饰的华人男子派送喜帖,纳彩仪式礼物中的宋吉缎(Kain Songket)、金色槟榔(Pinang Mas)、婚宴中宴客的椰浆饭(Nasi Lemak)和娱宾的咚当撒央(Dondang Sayang)表演也都凸显马来文化特色。^②

在日常生活中,“峇峇”的服饰与饮食文化也都打下明显的马来文化烙印。“峇峇”服饰的“马来化”,以女性服饰最为明显。新加坡“娘惹”下身所着彩色纱笼(Sarong)多来自爪哇岛的峇迪布(Batik)制成,年长“娘惹”一般上身着长衫(Baju Panjang),年轻“娘惹”则喜穿可峇雅短罩衫(Kebaya)。据李钟珏1887年游历新加坡所见,“久居叻之华人,多娶土人女为室,其装饰与安南女子略同,窄袖宽衣,其长没足,因而所生之女,亦从土装。闻闽人潮人家中,竟无一汉装妇女者,不若男子尚有一辮,存其本真也”。^③“峇峇”饮食的“马来化”,则体现在“娘惹菜”的形成。“娘惹菜”将传统中国菜烹饪方法和马来常用香料融为一体,喜用酸角果肉、石栗、香茅等多种香料调味,融合了甜酸、辛香、微辣等多种风味,比较典型的“娘惹菜”有酸角炖猪肉、黑果焖鸡、叻沙(Laksa)等。进餐时遵循马来习俗,用右手抓饭,筷子往往只在祭祖的供桌上和婚礼的“进房”(Chim Pang)仪式中才会出现。

可以说,新加坡土生华人虽然始终有意保持华人传统中的核心原则,保留一些具有祖先传统的文化实践,但在马来人的影响下,在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都进行了本土化的调适,并呈现出“马来化”的特性。

(二) 语言、宗教信仰及生活方式的“英化”

新加坡华人的文化形态始终处于调适过程之中,并受到“地方政治与社会文化趋力影响”。^④继“马来化”之后,随着1819年新加坡开埠以及1826年新加坡、马六甲和檳榔屿三地被英国整合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殖民地的统治政府用政治的力量,——属地主义的国籍法——文化的力量,——殖民教育的提倡”,^⑤又造成土生华人“英化”的倾向,从而形成华巫西兼容的文化特点。

在1914年以前,英国大部分的国籍法是不成文的,主要实行依据出生地而对臣民身份进行判定的习惯法。在英属殖民地出生的人因符合臣民效忠原则,被授予英国臣民身份。^⑥在新加坡出生的土生华人,也因此获得英国国籍。他们大多接受英语教育,并且凭借出色的多语种沟通能力成为欧洲商人与马来人之间通商的中介,其中的精英人物还被殖民政府承认为华社的代表,委以立法议员、市政委员等职务。1887年,海峡殖民地总督史密士(Cecil Clementi Smith)还专门设立英女皇奖学金(Queen's Scholarships),奖励接受英语教育并且成绩优异的土生华人子弟赴英国本土深造。在英殖民政府的扶植下,林文庆、宋旺相等一批曾赴英留学的“峇峇”精英逐渐成长为峇峇社会乃至整个华社的领袖。在利益的驱动下,部分“峇峇”在政治或文化认同上一度亲英,“开始将英人的他称'Straits Chinese' 'Straits-born Chinese' 转为自称”,“自认是本土之子(Sons of the Soil) 或大英

① J. D.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4.

② Peter Wee, *A Peranakan Legacy: The Heritage of the Straits Chinese*,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 2010, pp. 20 - 21.

③ 李钟珏著,许云樵校注《新加坡风土记》新加坡南洋书局,1947年,第10页。

④ 陈志明《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38页。

⑤ 详见李长傅《华侨研究之基础问题》载《南洋研究》,1939年第4期,收入《南洋史地与华侨华人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页。

⑥ Rieko Karatani, *Defining Britain Citizenship: Empire, Commonwealth and Modern Britain*,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3, p. 41.

子民(或英华人, King's Chinese)”。^① 1900年,林文庆、陈若锦、余连城和宋旺相等接受英文教育的土生华人,还成立了“海峡英籍华人公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向英女皇表示忠诚。

土生华人在家庭中往往使用峇峇语交流,在社交场合则多用英语。新加坡开埠不久,莱佛士即于1823年创办了采用全英文授课模式的新加坡书院(Singapore Institution)。^②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语的实用价值越来越为土生华人所认可,并逐渐演变成土生华人的第二语言。在土生华人社会中,还出现了自创的英文报刊,其中出版时间最久的是宋旺相联合林文庆创办的《海峡华人杂志》(Straits Chinese Magazine)。该杂志于1897年创刊,1907年停刊,持续办刊达10年之久。由于与欧洲商人的频繁交往,土生华人社会中通行的峇峇语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吸纳了许多源自英语、葡萄牙语、荷兰语等语种的词汇,表达更趋多元化。通过罗马字母的书写,峇峇语也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一度成为土生华人社会中重要的书面语言。

华人的宗教信仰形态也发生了一定变化。1819年10月,新加坡刚刚开埠,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米顿(Samuel Milton)就来到新加坡在华人中传播基督教。在莱佛士的资助下,米顿建立了新加坡第一所教会学校,“作为学习中文以及拓展福音之用”。^③ 虽然由于中西文化上的差异,早期改信基督教的华人并不多,但语言与教育的影响力是巨大的,随着英语教育在土生华人中越来越受欢迎,基督教在新加坡华人中的传播也有了很大的进展。新加坡卫理公会传教士阿尔汉(William F. Oldham)1886年创办的教会学校英华学校(Anglo-Chinese boy's school)发展迅速,很快与新加坡最好的非教会学校莱佛士书院齐名。1889年,土生华人中的基督徒成立新加坡中华基督教会(Singapore Chinese Christian Association),广泛吸纳“所有渴望得到宗教和道德开导,以及追求知识的海峡侨生”。^④ 新加坡中华基督教会1890年经海峡殖民政府批准为第一批免于注册社团,首届主席为刚刚留英归来的土生华人宋旺相,他早在婴儿时期就已在磐石堂(Prinsep Street Presbyterian Church)受洗。由于基督教禁止偶像崇拜,华人基督徒也不再保持祭祀祖先的习俗,而是用清明节到祖先墓前献花等方式来表达对祖先的纪念。^⑤ 华人基督徒结婚时也不再遵照华南古礼,而是披婚纱穿西装在教堂举行婚礼。^⑥ 华人的传统信仰和习俗,受到基督教极大的冲击。

在生活方式上,土生华人也逐渐英化。在社交场合,男子往往放弃中式长袍改穿西装,女子的珠绣鞋(kasut manek)也受到正在英国盛行的洛可可(Rococo)风格的影响,更加华丽。在进餐时,土生华人逐渐改用汤匙和叉子,富有的家庭还会购买由欧洲进口的餐具。西洋的音乐和西式的体育活动也开始走入他们的生活,部分土生华人开始养成听古典音乐、打网球和桌球、上俱乐部打牌的休闲习惯。受英国俱乐部文化的影响,土生华人社会成立了多个俱乐部进行社会交际、文化娱乐,如海峡华人体育会(Straits Chinese Recreation Club)、海峡哲学研究会(Straits Philosophical Society)、海峡华人足球协会(Straits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威基利俱乐部(Singapore Chinese Weekly Entertainment Club)、海峡华人读书会(Straits Chinese Reading Club)等。其中威基利俱乐部(Singapore Chinese Weekly Entertainment Club)是华社唯一始终有固定会所的俱乐部,由林文庆于

^① “Straits Chinese”, “Straits-born Chinese”一般译为海峡华人、海峡土生华人。详见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15页。

^② 1868年,为了纪念莱佛士,新加坡书院更名为莱佛士书院(Raffles Institution)。

^③ S. Raffles,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Public Services of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London, 1830, vol. 2, p. 37.

^④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London: John Murray, 1923, p. 254.

^⑤ Sng. Bobby and Choong. Chee pang, *Church and Culture—Singapore Contest*, Singapore Graduates' Christian Fellowship, 1991, p. 32.

^⑥ Sng. Bobby and Choong. Chee pang, *Church and Culture—Singapore Contest*, pp. 36 - 37.

1891年创立,位于安祥山(Ann Siang Hill),会员均为土生华人中的精英分子。

19世纪后半叶,土生华人在“马来化”基础上的“英化”倾向已十分显著,并与不断涌入的新客华人形成鲜明对照。新客华人源源不断移民到新加坡,对于华社具有深远的结构性影响,有利于新华社会与中国在经济上、文化上保持持续的联系。不过,土生华人人数量虽然少于新客华人,^①但英化的海峡华人领导层在殖民地政府扶植下的强势崛起,对整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不容低估。

二、新加坡华人“再华化”的主要文化表现

“马来化”与“英化”造成新加坡华人的文化形态发生明显的变化,并影响到华人语言的传承,虽然“族群认同的延续并不依赖于特定语言之延续,但语言变迁则会影响到对认同的理解与文化表达”,^②因此,“马来化”与“英化”给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加坡土生华人造成了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王赓武认为“除了根据接纳国的法律定义和要求公布的官方人口统计外,个人认同唯一可靠的检验是某人自我认同为华人,而且他人承认他是华人。前者集中在心理方面,而后者基本上侧重于生理特征。”^③土生华人自我认同为华人,也被当地土著和殖民者承认为华人,但因他们多不会说华语(官话)和方言,而被人数众多的新客华人认为并非“纯华人”。土生华人得到殖民者的优待,接受英语教育,加入英国国籍,但社会地位却远低于英国人。对于这些接受现代教育并引发了对殖民政策反思的土生华人来说,族群的现状和前途令人忧虑,“中华文化看来是救他们于无所适从之文化困境的生命线”。^④

新加坡华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追寻与清驻新加坡历任领事官推行的各项文教措施所引发的华人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具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清驻新加坡第一位常驻领事左秉隆,更被誉为“新华文化的奠基者”^⑤。随着华人大量移居海外,以及清政府与外国来往日益频繁,清统治者逐渐改变视海外华人为“天朝弃民”的旧观念,于1877年在新加坡设立临时领事馆,与英国争夺对新华社会的控制权。1881年,经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与英国外务部进行艰难谈判,英国终于同意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永久性领事馆。左秉隆1881年上任后长期坚持“劝兴义学,讲圣谕,开文会”^⑥,所办会贤社以儒家命题课士,雄辩会(Celestial Reasoning Association)以英语宣讲儒学,不仅推动了新华士阶层的兴起,也增强了土生华人的华人性(Chineseness)。“中华文化悠久绵远,具有独特魅力”,^⑦“一些土生华人从中华文化中找到了新的充满自豪的归属,并试图实现自身的再华化”。^⑧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兴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具体包括华语运动的滥觞和儒教复兴运动的兴起。

(一) 华语运动的滥觞

华语运动发端于新加坡华语训练班(又名官话传习所)的成立。^⑨华语,在这里并不泛指所有

① 1881年,新加坡华人总数为86766人,其中海峡华人9527人,占11%。详见*Report of Census of Singapore 1881*。

② 陈志明《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第5页。

③ 王赓武《移民与兴起的中国》,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5年,第182页。

④ (美)孔飞力著,李明欢译《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第257页。

⑤ 柯木林《新加坡领事官左秉隆:事迹与历史评价》,刘泽彭主编《互动与创新:多维视野下的华侨华人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页。

⑥ 李钟珏著,许云樵校注《新加坡风土记》,第6页。

⑦ 曾光光《近代国学倡导者关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思考与探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⑧ (美)孔飞力著,李明欢译《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第256页。

⑨ 详见“The Singapore Chinese Mandarin in Class”,*Straits Chinese Magazine*,1904,9. Kiong Chin Eng, “The Teaching of Kuan Hua in Singapore”,*Strait Chinese Magazine*,1907,9.

汉语方言,而特指汉语官方标准语,也就是官话。之所以发起华语运动,主要在于新加坡华社语言情况复杂,土生华人多以峇峇语为母语,新客华人往往也只会讲自己家乡的方言。这种语言状况既不利于华人之间互动沟通和华社的团结,也不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乡土籍贯是早期华社最基本的纽带,基于沟通的方便,操同样方言的同乡往往聚在一起互帮互助。为了避免纠纷,殖民地政府也规划华人按方言分区居住,以便于分而治之。1822年莱佛士市区发展计划即规定,闽帮居住在直落亚逸(Telok Ayer Street)、潮帮居住在沙球勝路(Circular Road)、广帮居住在牛车水(Kreta Ayer)等。因此,新加坡华社同一方言群往往聚居在一处,并形成了福建、潮州、广府、海南和客家五大方言群。“中国移民之间基于方言和地缘的亲情,远比身为中国人的国族情感更为恒久炽热”,^①不同的方言群之间壁垒很深,土生华人和新客华人之间也由于语言问题发生过“纯华人”与“非华人”的争论。1898年,获得英女皇奖学金的第一位华人林文庆从英国学成归国后在其私人寓所开办华语训练班,在土生华人中积极推广华语。由于“采用新颖的华文教学法,加上以生动的演辞讲解儒学和比较儒家哲学与基督教神学,所以吸引了许多老幼峇峇”。^②于是,林文庆又在威基利俱乐部、英华义学(Anglo-Chinese Free School)^③等处开设华语训练班,以容纳更多的学生。

林文庆是华语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但他并非孤军作战。很多土生华人在认识到共同的语言在文化认同、族群认同中的重要性后,都很支持这一活动,并尽自己所能为推广华语出一份力。例如黄献文就建议采用注音符号学习华语并协助林文庆开设华语学习夜班,龚振荣还在《海峡华人杂志》上发表英文文章专门介绍新加坡教导“官话”的历史。^④

华语运动的蓬勃开展引发了清驻新加坡领事馆的关注,并获得了领事馆的有力支持。1903年,林文庆在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馆和海峡华人体育会^⑤增设华语学习夜班,将培训对象由土生华人扩展到整个新加坡华人社会。经总领事凤仪同意,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馆秘书也加入进来,参与了培训的实际工作。培训结束后,由总领事亲自主持华语考试,合格者颁发证书,这一举措使华人群体学习华语的热情进一步高涨。^⑥

林文庆也曾试图获取海峡殖民政府的支持,但未取得成功。1902年,林文庆以立法院华人议员的身份,在立法会议上请求海峡殖民政府为华人开设华文班,遭到总督弗兰克·瑞天咸(Frank Swettenham)的拒绝。在未获得殖民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华语运动仍然坚持了十余年之久,其中“中国因素十分重要”^⑦。华语运动的持续广泛开展,推动了新加坡华社内部分散的帮群意识上升为华人的族群意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

(二) 儒教复兴运动的兴起

语言与文化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儒教复兴运动(The Confucian Revival Movement)与华语运动大体上同时兴起,并互相推动。“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虽明显受中国本土的孔教运动影响,但与康有为试图借助政治的力量将孔教定为国教不同,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走的是民间化的道路”,^⑧政

① (美)孔飞力著,李明欢译《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第24页。

② 李元瑾《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1年,第65页。

③ 英华义学由闽商颜永成创办,又称英华书塾,位于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华人俗称源顺街)。最初为家境贫寒的学生免费提供中英双语教育,以保存华人文化,后来在英殖民政府鼓励英语教育政策的影响下,演变为纯粹的英语学校。

④ Kiong Chin Eng, “The Teaching of Kuan Hua in Singapore”, *Strait Chinese Magazine*, 1907, 9.

⑤ 海峡华人体育会成立于1884年,1887年购置自有场地,出资人为闽商章芳林,故该场地命名为芳林铺(Hong Lim Green)。

⑥ Kiong Chin Eng, “The Teaching of Kuan Hua in Singapore”, *Strait Chinese Magazine*, 1907, 9.

⑦ 李元瑾《是历史巧合抑或是互动模式?——中国两次社会变革与新加坡华人的回应》,载《世界民族》2009年第3期。

⑧ 张晨怡《中西文化交汇与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的兴起》,载《世界民族》2020年第2期。

治意味并不浓厚,宗教意识更为凸显。儒教复兴运动倡导者将儒学定位为儒教,采取创办孔庙、纪念孔子诞辰等方式来唤醒和激发新加坡华人文化血脉中的儒家意识,并发表演说、编写儒学读本进行儒学普及化的工作。此外,他们还通过与基督教论争构建和完善儒教的理论体系,来消除基督教在华人中的影响。

孔庙是供奉祭祀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庙堂,也是传播儒家思想的文教圣地。然而延至19世纪末,新加坡却仍然没有一间孔庙的存在。因此,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伊始,即有兴建孔庙之议论。早在1896年,刚刚从中国回到新加坡继承家业经商的邱菽园就已经有兴建孔庙的构想,不过反响不大。邱菽园是一位新客华人,在家乡他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教育,后来又受到康有为孔教思想的影响。邱菽园创办的华文日报《天南新报》不仅采用孔子纪年,还在1900—1901年密集刊登王恩翔的《星洲宜建孔庙及开大学堂说》^①、丘逢甲的《劝星洲闽粤乡人合建孔子庙及大学堂启》^②等一系列文章,制造倡建孔庙的舆论。1902年3月,在署理新加坡总领事、闽籍富商吴寿珍的支持下,新加坡倡导儒学复兴的一众代表在同济医院召开会议,“创建新加坡孔庙学堂董事会”成立。董事会由195名董事组成,邱菽园、林文庆、吴寿珍、陈武烈、张克诚等均列名其中,这也标志着儒学复兴运动进入高潮。^③

与此同时,纪念孔子诞辰活动也广泛开展起来。1900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本坡各籍华商如源顺街、老吧萨、中街、垫邦路头、十八溪墘、水厝尾、山仔顶、漆木街、新吧萨、水仙门、牛车水各等处,靡不结采燃灯,同申祝愫”,“萃英书院各义学向例于七月初七日祭祀奎星”,也在陈若锦、李清渊等土生华人领袖的倡导下,首次举行纪念孔子诞辰活动。^④奎星,也称魁星,是中国民间信仰中主宰天下文运的神。新加坡各义学由祭祀奎星改为纪念孔子诞辰,反映了儒学思想在新加坡影响的逐渐深入。

儒教复兴运动高涨时期,还出现了“万人围坐齐倾耳,椰子林中说圣经”^⑤的盛况。新加坡华人团体“华人好学会”(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⑥及其分会“华人好学会支会”^⑦举办的许多演说都涉及儒学方面的命题,如《孔子的教诲》《孔教关系》《海外兴建孔庙宜尊亲并重论》等。随着儒学氛围日渐浓郁,新加坡华人对儒学书籍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新加坡最早的印书馆——古友轩(Koh Yew Hean Press)的广告,当时在新加坡能买到的儒学书籍主要有《朱子格言》《四书根味》《礼记精华》《礼记旁训》《礼记正义》《春秋左传》《四书不二字》《朱子广训》《四书补注》《四书阐注》等。^⑧这些书籍对于中国本土的士人来说并不艰深,“但因为海外华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够,或因语言所限,若要把孔孟之道在海外华人中有效地和普遍地宣扬,就有必要重新编订旧教材和旧课本,甚或用白话编写”。^⑨在这方面,邱菽园的贡献最为突出。为了普及中华文化,他相继编写了《浅字文》《新出千字文》等比较浅显的华人识字课本,“用较为浅白的语言和熟悉的事例,去介绍儒

① 王恩翔《星洲宜建孔庙及开大学堂说》,载《天南新报》,1900年3月26日。

② 丘逢甲《劝星洲闽粤乡人合建孔子庙及大学堂启》,载《天南新报》,1900年3月27日。

③ 详见《创建新加坡孔庙学堂董事》,载《天南新报》,1902年3月19—20日。

④ 《圣诞脐欢》,载《天南新报》,1900年9月21日。

⑤ 丘逢甲《自题南洋行教图》,载《岭云海日楼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69页。

⑥ 1896年,林文庆与宋旺相发起创办“华人好学会”,为土生华人提供学习英国文学、西方音乐和中华语言的机会。详见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London: John Murray, 1923, p. 236.

⑦ 1899年,在林文庆的建议下,“华人好学会”成立分会,吸纳新客华人参与,由林文庆与邱菽园共同主持,宣扬儒教,支持维新,学会性质发生变化。详见《好学会简明章程》,载《天南新报》,1899年9月22日。

⑧ 《日新报》,1899年10月18日。

⑨ 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儒家思想与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史料汇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59页。

家历久不变的真理”。^①他创办的《天南新报》还长期连载《理学问答》《孔教撮要白话》等儒学普及性文章和书籍,积极推动儒学在新加坡的本土化、通俗化。

据颜清湟的研究,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开始于1899年,结束于1911年。^②但到1902年,儒教复兴运动在掀起一个高潮后,渐次衰歇,很多活动难以持久进行,孔庙因“事无专责,人无专任,彼推此诿”^③等各种人事的纠葛也没有在新加坡真正建成,持续时间最久的主要是儒教与基督教的论争。儒基之争论辩的一方为林文庆、龚振荣等主张复兴儒教的土生华人,另一方为牧师慕雷(William Murray M. A.)等西方传教士和一些信仰基督教的土生华人。林文庆、龚振荣等主要以《海峡华人杂志》为基地,从1899年到1907年连续发表《儒家的人性观》(Confucian View of Human Nature)、《儒家的伦理基础》(The Basis Confucian Ethic)、《儒家统治下的妇女地位》(The Status of Women under the Confucian Regime)等英文文章,对基督教展开了猛烈的抨击,认为基督教的创世说、博爱说、人性观、妇女观等方面均具有致命的缺陷,与之相比,“儒教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也是人类最成功的宗教”。^④由于论辩主要通过英文进行,因此在受英语教育的土生华人中影响很大。《海峡华人杂志》是由宋旺相领导的新加坡中华基督教会发起创办的,但是林文庆却将其改造成为儒教复兴的阵地,这也体现了儒教复兴运动领导人面对基督教流传日广所产生的强烈危机感,同时也蕴含着华人消解文化殖民主义的意图。

语言和文化的民族和族群认同的基础,华语运动旨在以华语为华社共同的语言表征,儒教复兴运动力图将儒学改造为儒教作为华人唯一的信仰支撑,“所有这些由邱菽园、林文庆和其他改革者在新加坡所做出的努力都是为了在一个迅速西化和马来化的华人社会中弘扬中国文化的本质”,^⑤并从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中获取到改造新华社会的力量。李元瑾因此认为“推广华语和复兴儒学是一场持续多年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它同时具有‘再华化’和‘去殖民化’的义涵”。^⑥而这种“再华化”和“去殖民化”的动力,一方面肇始于清驻新加坡领事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所带来的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回归,另一方面则与接受英殖民政府提供的现代教育的新加坡华人觉醒后对殖民政策的批判与反思密切相关。

三、新加坡华人“再华化”的政治影响

新加坡华人的“再华化”不仅体现在文化方面,也表现在他们对于中国政治的强烈关注与积极参与,此时的新加坡华人在政治意识上并不认同其居住地,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对中国国家的认同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新加坡华社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回归,“给来自中国的政治活动家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可以动员组织力量的特殊舞台”。^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族对中国的政治意识逐渐潜滋暗长”。^⑧新加坡华社在各种政治活动和思想的刺激下,呈现出高度政治化的局面,促使华人进一步认识到“一个强盛的、现代化的、令世人尊敬的中国才能够真正成为海外华人

① 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19世纪末新加坡的“儒学运动”》,载《亚洲文化》,1988年第11期。

② Yen Ching-hwang, “The Confucian Revival Movement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99 - 1911”,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arch 1976.

③ 林芷侑《答客问本坡孔庙学堂事》,载《天南新报》,1902年9月27日。

④ Lim Boon Keng, “The Confucian Ideal”,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1905, 9.

⑤ 梁元生《新加坡儒家思想教育的三种模式》,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

⑥ 李元瑾《从文化殖民的视角重读新加坡海峡华人的失根与寻根》,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

⑦ (美)孔飞力著,李明欢译《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第255页。

⑧ 崔贵强《星马史论丛》,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年,第37页。

的靠山”^①，因此，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和革命运动均有所回应，并对中国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新加坡华人与清政府的官方联系

早期新华社会主要由华商与华工组成，他们虽然渴望落叶归根，但是与中国的联系主要是文化、经济方面的，对中国政治一般持比较疏离的态度。1877年清驻新加坡领事馆的设立，建立了新华社会与清政府之间的官方联系。清驻新加坡历任领事官不仅在华人中播撒中华文化的种子，还努力激发他们对清政府的忠诚之心。除了利用会贤社、雄辩会、图南社等社团的政治议题，引发新华社会对中国政治的持续关注外，领事官们还通过售卖官衔等措施，拉拢了不少华商依附于清廷。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政治局势日趋复杂，维新派和革命派先后来到新加坡争取新加坡华人的支持。“中国政局导致新加坡华社分裂为亲清廷的当权派（以中华商务总会为基地）、亲康有为的保皇派（以邱菽园为首）和亲孙中山的革命派（以晚晴园为基地）”。^②华人的政治意识就在这种对抗性的政治氛围中逐渐增强，华社各派的经济利益、政治立场与救国理念虽然并不一致，但政治认同的指向均为中国。

面对新的政治形势，清政府调整了华侨政策，开始在海外各埠建立中华总商会作为领事馆的外围组织以辅助领事馆控制海外华社。1906年，在清对外考察商务大臣、曾署理新加坡总领事的张振勋的推动下，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成立，首任会长为曾署理新加坡总领事的闽籍富商吴寿珍。商会的领导层涵盖闽粤等各帮，一改“华商竟若散沙撒地”的局面。^③商会在清农工商部备案，接受清“关防”，在清政府与殖民地政府争夺对华社的控制权时坚定地站在清政府这一边，对于革命派的海外反清活动也持反对态度。

（二）新加坡华人对维新运动的关注

在清政府试图加强控制华社的同时，维新派和革命派也在新加坡进行密集的活动，希望将新加坡变成自己的海外基地。与革命派相比，以光绪帝为号召的维新派在新华社会具有更深厚的基础。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亲清廷的《叻报》和政治色彩比较淡薄的《星报》，都曾热烈报道过维新派的改革举措，邱菽园创办的《天南新报》更明确表示支持维新派，并希望通过维新变法，实现“行见孔子大道复明于今日，泰西新法收效于中华矣”^④的目标。

戊戌政变发生之后，《天南新报》连续发表文章，反对清廷追捕维新派，表示“若必严行捕戮，绝其故国之尊，恐此等热血多而涵养少之人激而思变”，^⑤并反复督促海外华商电请“皇太后归政”^⑥于光绪帝。邱菽园还赠予素未谋面的康有为千金，邀请他到新加坡避难。^⑦1900年2月，康有为抵达新加坡，这也是康氏七次来到新加坡之始。此外，邱菽园还出资支持了保皇运动中唯一一次起义，即1900年8月自立军在长江沿岸地区发动的武装起义。

除了邱菽园，儒教复兴运动的另一位重要领袖林文庆也支持维新运动。他是倡导儒家文化、宣传维新思想的华文报纸《日新报》的创办者，也是《天南新报》的英文总主笔，并亲自撰写了《中国的维新》（The Renovation of China）、《光绪皇帝》（His Imperial Majesty Kwang-su）、《维新者遭迫害》（The Persecution of the Reformers）等多篇英文文章支持维新变法。1901年，林文庆在英国伦敦出版

① [美]孔飞力著，李明欢译《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第256页。

② 详见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上册，第199页。

③ 《商界光明》载《叻报》，1906年4月19日。

④ 邱菽园《致江南道监察御史曾》，载《天南新报》，1898年6月2日。

⑤ 《论严治新党非中国之福气》，载《天南新报》1898年11月15日。

⑥ 《海外华商宜再举行电请圣安并请皇太后归政说》，载《天南新报》1899年12月28日。

⑦ 详见康有为1899年诗《邱菽园孝廉未相识哀我流离自星坡以千金远赠于港赋谢》，《康有为全集》第12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1页。

了他的英文著作《中国内部之危机》(*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在该书中,他详细记叙了戊戌维新变法的全过程,并盛赞“维新运动是一个民族性的觉醒”。^①对于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的“保国、保种、保教”思想,林文庆深感共鸣,并在他发起的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改革运动中加以践行。

(三) 新加坡华人对辛亥革命的参与

革命派最初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影响并不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首次到新加坡的时间是1900年7月,与康有为首次抵新时间为同一年。此时的新华社会整体上倾向支持保皇势力,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为了争取康有为的合作专程到新加坡活动,结果被海峡殖民政府拘捕。孙中山立即前往营救,经时任立法局议员的林文庆向海峡殖民政府疏通,宫崎寅藏获释,但孙中山本人还是被海峡殖民政府驱逐,5年之内不得入境。^②

在孙中山被限制进入新加坡的5年间,维新与革命思想进行着此消彼长的转换。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一部分维新派的支持者对康有为感到失望而开始转向支持革命。1901年,土生华人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等组织“小桃源俱乐部”,议论时事,并在由维新转向革命的举人黄乃裳和革命党人尤烈的影响下,成为革命派的拥护者。1903年,“苏报案”发生后,清廷要求上海租界当局“引渡”邹容和章太炎,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等以“小桃源俱乐部”的名义发电报给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反对“引渡”二人。最终,邹容、章太炎在各方的努力下,未被移交给清政府。这一结果,使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等人大受鼓舞,极大地激发了他们进一步参与中国政治的积极性。此后,他们“出资筹办图南日报,为南洋群岛革命党人之第一言论机关”,^③还将邹容宣传革命的名篇《革命军》易名为《图存篇》大量翻印,一部分由新加坡书店孔明斋代售,一部分秘密运回中国本土散发,广泛宣传革命思想。

1905年孙中山从欧洲到日本,途经新加坡时,经尤烈引荐,首次与张永福、陈楚楠等会面。1906年,孙中山再次来到新加坡宣传革命,居住在张永福的别墅晚晴园内,此后数次到新加坡也多半居于此,晚晴园由此成为革命派在新加坡的主要基地。是年4月,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在晚晴园正式成立,这是“南洋英荷两属之革命总机关部”,^④由陈楚楠、张永福分任正副会长。经孙中山劝说,对革命持保留态度的林文庆也加入其中成为新加坡早期的同盟会员。陈楚楠、张永福二人担任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领袖多年,不但创办《中兴日报》与主张保皇的《南洋总汇报》展开论辩,还捐资赞助孙中山在晚晴园策划的黄冈起义、镇南关起义、河口起义等多次起义,使新加坡逐渐成为革命派的活动中心。

(四) 媒介论战与民族主义的形塑

维新派、革命派在对自身思想宣传的过程中,都意识到报刊媒介的重要作用。早在1898年,邱菽园就创办了《天南新报》进行维新思想宣传,创办宗旨为“大开民智,辅翼我国家,宣扬我圣教”。^⑤除邱菽园、徐季钧、林著筹外,“在该报发表文章者有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丘逢甲、张之洞、黄世仲、黄伯耀、陈楚楠等”,^⑥不过,黄世仲、黄伯耀、陈楚楠等后来相继由保皇转向革命。1901年,邱菽园迫于清政府的压力,辞去《天南新报》总理及华文总主笔的职务,“他此后的生活,似乎离政治越

① Wen Ching, *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 London: Grant Richards, 1901, p. 62.

② 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第57页。

③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80页。

④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183页。

⑤ 《添延外埠来访人告白》,载《天南新报》1898年6月17日。

⑥ 段云章《戊戌维新的“天南”反响——以新加坡〈天南新报〉和邱菽园为中心》,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

来越远,而对诗的兴趣越来越大”。^①后来,《天南新报》几经易手,终因财政不支于1905年停刊。

此后,保皇会又控制了《南洋总汇报》作为自己的喉舌。1905年,张永福、陈楚楠、许子麟、陈云秋等在已停刊的革命派报刊《图南日报》的基础上创办《南洋总汇报》。由于张永福、陈楚楠等人主张宣传革命,许子麟、陈云秋等人主张宣传保皇,自创刊起双方就矛盾不断,只好用抽签的方法决定办报走向。陈云秋中签后,又邀请了倾向保皇的朱子佩参股。结果,张永福、陈楚楠等人撤股,康梁的追随者徐勤、欧榘甲、武宪子等加盟,《南洋总汇报》成为保皇派的机关报。

张永福、陈楚楠等被排挤出《南洋总汇报》后,又于1907年创办了《中兴日报》作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机关报。《中兴日报》的宗旨“在开发民智,而使数百万华侨生其爱种爱国之思想也”,^②自创刊之日起,即与《南洋总汇报》发生了长达三年的激烈论战。胡汉民、汪精卫、居正、田桐等人均曾代表《中兴日报》参与笔战,孙中山本人也以“南洋小学生”为笔名发文驳斥保皇派“革命足以召瓜分”的论调。^③

革命派与保皇派在《南洋总汇报》《中兴日报》等报刊上的论战,使革命思想与保皇思想在不同阶层的华人脑海中激荡,促使他们思考爱家、爱乡与爱国的关系,并形塑了新加坡华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于生活在殖民政府统治之下的新加坡华人来说,民族主义正符合他们的内在需求。正如孔飞力所说“民族主义诉求适应了多重需求,营造一种能够提升华人地位,增强华人安全感的自我形象,或曰华人群体的共同形象;超越地缘、方言的差异,增强相互团结,共御外来威胁,维护华人的经济利益。”^④

从总体上讲,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对政治有极高的参与意愿,但在英殖民政府统治之下,除少数土生华人精英外,大部分华人被排除在殖民地政治之外。清政府与英殖民政府对华社的争夺,维新派和革命派在新加坡的思想传播和政治活动,强化了新加坡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冲击了新加坡的华社,促使本地华人经历政治化的过程,同时也牵动了海外华人再中国化的民族主义情感”。^⑤这种民族主义情感的影响是长期的,导致新加坡华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对中国政治一直保有持久的参与热度。

四、结 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的“再华化”是相对于新加坡华人特别是土生华人的“马来化”和“英化”倾向而言的。新加坡华人在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的“马来化”和“英化”,是一种本土化的文化调适,并影响到华人的文化表达。这一现象虽为英国殖民者所乐见,并将亲英的土生华人精英视作控制华社的有力工具,却让已经不再视海外华人为“天朝弃民”的清政府深感忧虑。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左秉隆、黄遵宪等历任领事官均致力于在新加坡社会中推广中华文化,增强新加坡华人的归属感,为新加坡华人的“再华化”打下重要的基础。新加坡华人的“再华化”虽有明显的中国因素,但其内源因素却在于新加坡华人内部寻根意识的涌动。新加坡华人的“再华化”是一种经历过文化变迁之后的延续,这种延续并非单纯的回归,而是结合了新的社会文化要素后的反思与再造。林文庆、黄献文、龚振荣等一批受到现代教育的新加坡

① 茅海建《张之洞策反邱菽园》,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24页。

③ 南洋小学生《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载《中兴日报》,1908年9月12日。

④ (美)孔飞力著,李明欢译《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第254页。

⑤ 详见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上册,第249—250页。

华人精英对于“文化殖民主义有着比较强烈的觉悟和反弹,言行中带有文化民族主义的色彩”^①视“马来化”和“英化”为“失根”,在改造新华社会的过程中试图带动更多的新加坡华人——不管是土生华人,抑或是新客华人,“一同寻根、一起踏上回归中华文化的历程”^②并深刻影响到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变革。

新加坡华人的“再华化”在文化和政治方面均影响深远。虽然新加坡华人并非一个同质化的群体,宋旺相、宋旺裕、陈文源、林观泰等一部分土生华人始终与新客华人群体保持距离,对中华文化缺乏兴趣,也不关心中国政治,但是“二战前数十年,新加坡中华文化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③,直到新加坡建国,新加坡华人的政治认同才完全由中国转向新加坡。然而新加坡独立之后,在“新殖民主义”的影响下,“各族的母语却沦为第二语文,文化传承遭遇巨大的困难,其中华族文化失根的情况最为突出”^④。这引起了峇峇出身的李光耀、吴庆瑞等新加坡领导人的反思,于是从国家层面开始倡导推广华语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新加坡华人社会再度出现“再华化”现象。当然,新加坡前后两次“再华化”有着显著的不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的“再华化”不仅是关乎文化的,也是关乎政治的,基本等同于“再中国化”,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加坡华人“再华化”仅涉及文化方面的内容。第二次儒学复兴运动已于20世纪80年代末结束,“讲华语运动”至今已延续40余年,但比较强调实用,缺乏深厚的人文底蕴,如要长期延续下去,并在族群认同、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百年前新加坡华人“再华化”过程中所蕴含的文化情怀足资借鉴。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 underwent a process from “Malayanization” and “Anglicization” to “Resinicization”. This self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in Singapore was not only about culture, but also about politics. In terms of culture, it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pursu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seen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ovement and the rising of the Confucian Revival Movement. In terms of politics, it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 its strong concern with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China’s politics, which has shaped the nationalist sentiments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in responding to China’s reform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

(张晨怡 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责任编辑:于红)

①③④ 李元瑾《从文化殖民的视角重读新加坡海峡华人的失根与寻根》,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

② 严春宝《他乡的圣人:林文庆的儒学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页。